

湘江头条

从圣人之道到实用之学——

# 桐城派与近代湖南文脉的『双向奔赴』

尧青飞



姚鼐。资料图

最近，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桐城派》在学界引发热议。这部纪录片分《正声初起》《开宗立派》《家家桐城》《中兴之路》《古典余晖》五个篇章，讲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桐城派兴衰变迁的恢弘历程。

纪录片的主线清晰表明：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湖南士人集团，不仅是晚清政治的支柱，也是桐城派得以起死回生、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文学走向的关键力量。桐城派与近代湖南文脉的关系，并非单向传衍，而是一场因应近代变革的“双向奔赴”。

## 在京师：湖南人遇见桐城文法

桐城派在清初到道光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与湖南关系甚浅。

清中前期，方苞立“义法”，刘大魁主“神气”，姚鼐集大成而分“义理、考据、辞章”以说文章，并通过《古文辞类纂》等著述创建了桐城派的文统。

然而，对于文坛上的桐城派运动，湖南大体置身之外。甚至乾隆年间姚鼐视学湖南，也不会影响湖南的文风。彼时，两湖尚未分属，湖南士子还在为科考煎熬。即便嘉庆以后，湖南士人如何凌汉、陶澍等人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学术却始终牢牢于理学之中，不遑在文章上有特别的表现。

可以说，清嘉道以前，湖南和桐城派几乎绝缘。然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后之学新。”嘉道之际，正是中国学术与文学的关键变革期。姚鼐高足梅曾亮活跃于道光时期的京师文坛，而一大批日后注定要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篇章的湖南人，也恰恰在京城默默成长。政治地位不高的梅曾亮，以古文为号召悄悄影响了一批湖南人，这为日后桐城派的中兴埋下了伏笔。

关于湖南人道光时期受梅曾亮古文法的情况，浙江仁和人邵懿辰（1810—1861年）在《孙芝房墓志铭》中写道：“余曩居京师，私幸得交湖湘间士大夫，皆魁垒杰特，嗜古博学……梅郎中用文术友教京师，月一再见，谈诗古文法，凡书册所有与今时事得失相发者，余与君及曾侍郎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相与极欢。”在这篇为善化孙鼎臣（1819—1859年）所作墓志铭中，邵懿辰讲述了他和曾国藩、孙鼎臣等人频繁从梅曾亮学习文术，讲论诗古文法的隐秘历史。桐城文脉传衍湖南，不妨从此论起。



纪录片《桐城派》海报。资料图



纪录片《桐城派》视频截图。

## 文章传衍：曾国藩与桐城法脉的继承与改写

当梅曾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离开京师，回到江南之际，曾国藩作《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诗以送之。这组诗歌高度评价了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地位，是所谓“方姚以后无孤语，嘉道之间又一奇”。然而梅曾亮南归，远离文坛中心，如此文章造诣，将来谁传衣钵？故曾国藩在诗的尾联云：“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明确提出桐城法脉未来谁属的关键问题。

历来喜欢讲述谱系的人，无论是孟子、司马迁，还是韩愈，在历叙道统、文统之后，必然将谱系的未来归结于“舍我其谁”，曾国藩也不例外。尤其是，曾国藩追求不朽的念头甚炽，其京师日记反省自己作诗“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看到何绍基的字“必传千古”，心下涌起焦灼万分，而古文则是曾国藩揣摩后可以立言不朽的自觉选择。

在率领湘军东征的早期阶段，戎马倥偬，曾国藩无暇玩味文章义法。不过，夷考曾国藩军中日记，仍可见他读书不辍，大量阅读桐城派典籍。有学者据日记考证，仅梅曾亮相关著述，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年的阅读即达32次（谢海林《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发微》）。

曾国藩如此频繁阅读桐城派典籍，始于咸丰九年（1859年），何以如此？一方面可说是军务稍暇，另一方面当与曾国藩自觉攀起桐城派大纛有关。正在这一年，曾国藩写下《欧阳生文集序》。此文在建构桐城派统系方面贡献卓著。如果说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标志着桐城派的建立，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则绘就了桐城派中兴的传衍图。

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曾国藩写道：“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诒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造此则又何求？”至此，曾国藩已将湖南人自觉不自觉靠拢学习桐城派的状况和盘托出。曾国藩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号召湖南人归附桐城派，他始终强调湖南人当接过桐城大纛。这便是文章后半部所云：“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咸丰兵燹以后，桐城派虽有势力范围生灵涂炭，而湖南则成为桐城文章传衍的沃土。

由此可见，在勋位日盛之际，曾国藩并未忘记文统的濡化，反倒试图借桐城派来完成士林的文学整合。只不过，曾国藩并非桐城派被动的接受者。他在揣摩桐城古文，追溯桐城派源流时，刻意强调湖南士人对桐城文统的继承，实则意在为自己挣得文坛地位。后来文学史论述的“湘乡派”的成立，正表明曾国藩这种文统再造策略的成功。

## 挽救世运：生生不息的湖南经世文章

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深刻影响了桐城派此后的发展。然仅仅依靠勋位，依靠《欧阳生文集》的统系建构，并不足以奠定曾国藩在近代文章史上的卓越地位。曾国藩实实在在培养出“曾门四大弟子”等，再造桐城派，乃在于他对桐城派有新的理论贡献。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

国藩对桐城派理论做出重大修正，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同治八年（1869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明确提出了这一纲领性的主张：“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制、政书，及当代世故皆是也。”这就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的基础上，增添了“经济”的因素。湖湘经世和事功的精神在此获得新的意义，助推桐城派发生转机。

曾国藩对桐城派理论的这一修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要古文不仅是载圣人之道工具，更要成为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筹划洋务、整军经武的实用之学。后来钱穆认为桐城文章“尚有时世”正基于此立论。由于曾国藩的影响，在人才济济曾氏幕府中，才涌现出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这四位以古文著称的“曾门四大弟子”。

不唯如此，曾国藩还敏锐指出，桐城前辈的文章虽有典则，但缺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故曾国藩有意提倡韩愈的文章，强调“雄奇瑰玮”的文章境界。至于提倡的成效，新文学家朱自清如是说：“桐城文统的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史记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朱自清《经典常谈》）这段话无不溢美的成分，然亦可可见此期曾国藩强健桐城派文格的成效。

有鉴于此，黎庶昌在总结曾国藩的文学成就时说：“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燹靡绝，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散道衰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继韩欧阳”这是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归有光的评价，黎庶昌以之誉曾国藩，似并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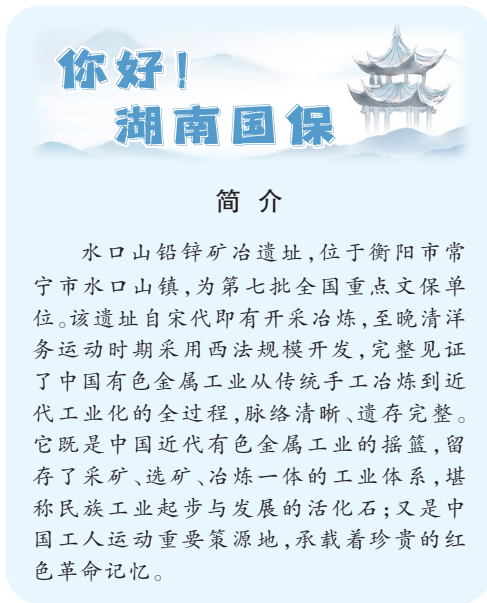
只是，中国近代是海水沸腾的激变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城派被激进者贴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标签。然而，若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审视，桐城派经由湖南近代的转化，其精神内核已融入中国近代化进程。譬如吴汝纶在后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古文作为吸纳新知识之容器；黎庶昌出使欧洲，写成《西洋杂志》，以桐城文法记录西方现代文明；薛福成的《观巴黎图画记》，既有桐城派的雅洁，又充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桐城派“熔铸新旧”传统在近代写下的光辉篇章。

桐城派对近代中国和湖南文脉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学者王达敏曾言：“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1949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王达敏《毛泽东与桐城派》）可以说，桐城派与湖南近代文脉的关系是一场“双向奔赴”。桐城派以其成熟的文章法则滋养了湖南文人，让近代湖南在中国文章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而湖南文人则以其经世务实之精神再造了桐城派，使其在王朝末世焕发了新的生机。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矿山儿女的家园

曹荣



## 简介

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位于衡阳市常宁市水口山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该遗址自宋代即有开采冶炼，至晚清洋务运动时期采用西法规模开发，完整见证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从传统手工冶炼到近代工业化的全过程，脉络清晰、遗存完整。它既是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留存了采矿、选矿、冶炼一体的工业体系，堪称民族工业起步与发展的活化石；又是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策源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革命记忆。

从衡阳出发，汽车在湘南丘陵间蜿蜒穿行，窗外的山色渐渐变得深沉。导航显示离水口山还有十公里，道路两侧开始出现灰扑扑的厂房、锈迹斑斑的管道与延伸向远方的旧铁轨。我摇下车窗，空气中隐约飘来一丝金属与矿石混合的气息——那是一种我无比熟悉的味道，带着炉火的温度、岩石的粗粲，也带着岁月无法磨灭的重量。

我在锡矿山干了大半辈子，干过锻工、守过冶炼炉、下过井。正是这份刻进骨子里的经历，让我对水口山有着天然的亲近。我怀着这份心情，走进了这片土地。

到达时已是午后。站在矿区入口，绿意正在覆盖曾经喧嚣的厂区，野草从废弃铁轨的缝隙里钻出来，在风里轻轻摇晃。接待我的老周是这里的守矿人，六十多岁，皮肤黝黑，手掌比我的粗糙。“我爷爷那辈就在井下干。”老周开口道。我点点头：“井下的苦、井下的险，我一点都不陌生。”

老周眼神里多了一份亲近：“原来你也是矿里人！那不用我多解释。”他领着我往老鸡巢矿区深处走去。脚下碎石铺就的小路嘎吱作响，转过一个山坳，几座巨大的冶炼炉基赫然矗立，像沉默的巨兽。我凝望那些被炉火熏得发黑的砖，焦痕几乎嵌进了砖石的骨髓，任凭百年风雨冲刷也无法褪去。我伸手触摸，指尖触到的粗粲冰凉，如此熟悉——那是在冶炼炉旁触摸过无数次的质感。

“这炉子，当年烧起来的时候，半边天都是红的。”老周说。我轻声接话：“是的。热浪扑面，火星溅在工作服上，身上到处是烙的洞洞。炉火旺的时候，夜里看过去，整片厂区都是亮的。”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水口山便已开启铅锌矿的开采与冶炼；明清时期，采矿冶炼渐成规模，炉烟袅袅，矿火不熄。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靠山吃山，依矿为生，在岩石与烈火之间摸索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

近代以来，水口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与数代矿工积累的技艺，这里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从手工开采到机械作业，从零散作坊到完整产业链，水口山在数十年间完成了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的跨越，成为湖南工业的先行者，更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当之无愧的摇篮。

老周边走边指给我看：如今的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总面积达120公顷，完整保留着19处重点文物点，其中地面遗存15处、地下遗址4处，构成了国内罕见、系统完整的工业遗产群落，你花几天时间也看不完。我们脚下的老鸡巢冶炼遗址、见证千年开采史的忆苦窿斜拉古矿井、记录机械化起步的2号与5号矿井、气势恢宏的龙王山露天采场、保留完整的第三冶炼厂早期厂房，以及承载红色记忆的康家戏台、康汉柳饭店、原矿务局办公室等遗迹，共同串联起水口山跨越千年的矿冶史诗。

走到竖井边，我停下脚步。那是一个幽深的黑洞，向着大地心脏延伸，黑暗浓稠得仿佛能吞噬目光。井口石壁上，几道深深的凹槽光滑发亮——是不是钢绳与矿绳百年摩擦留下的印记？留待考证。

“下过多少年的井？”老周问。我笑了笑：“三十多年。井下的黑暗、潮湿、压抑，还有头顶松石随时可能落下的凶险，我都

亲身体会过。”老周不再多言，只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有些感受，只有真正从井下走出来的人，才懂得其中千钧重量。

在没有现代机械化机械的年代，矿工们仅凭一盏油灯、一把铁锤、几根钢钎，在狭窄、潮湿、黑暗的巷道中匍匐前行。巷道低矮，只能弯腰弓背；岩层坚硬，一锤下去钢钎只留浅痕；空气浑浊，呼吸之间满是粉尘与潮气。他们手掌布满老茧，指缝嵌着洗不净的矿尘，脊梁被重担压弯，却始终挺直着做人的骨气。他们在黑暗里采掘光明，用最朴素的劳动撑起一座矿山，撑起万千家庭，更撑起中国近代工业蹒跚前行的希望。

从矿区核心走出，老周带我来到当年的工人生活区。

一排排青砖灰瓦平房整齐排列，木窗木门虽已褪色，却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一位老人坐在门前石墩上晒太阳，见我们经过，微微点头。老周说，这里不多的老人恋旧不走。

我站在老槐树下，脑海里浮现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天未亮透，矿工们推门而出，和邻居招呼一声，走向井口。妻儿倚门目送，转身走进厨房。傍晚归来，巷子里飘起饭菜香，孩童追逐嬉闹。矿山的日子很苦，但家很暖；矿井下很暗，但心里有光。

这里是几代矿山儿女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工作、老去，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这片土地。正是这些最朴素的日常，让冰冷的工业遗址拥有了温度与人情，让水口山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触。

在工人运动陈列室，我久久凝视着那张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绘画。黑白图卷里，三千余名矿工站成黑压压一片，看不清面孔，却能从他们挺直脊梁、紧握的拳头上，感受到撼人心魄的力量。

1922年，震撼全国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矿工们长期遭受压迫，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苦、生命无保障，却依然在黑暗中保持觉醒与抗争的勇气。三千余人团结一致，二十余天不退一步，最终赢得尊严与权益，在湘南大地点燃革命星火，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树立光辉典范。

矿山巷道里，曾传递革命思想；低矮工棚中，曾响起理想宣言；矿工们粗糙的手掌，曾紧紧握住信仰的力量。党组织到来，工人夜校点亮灯火，革命信念悄然传播，矿工们从为生计抗争，走向为光明、为解放而奋斗。工业文明与红色精神在此交融。

离开水口山时已临近傍晚。夕阳把冶炼炉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荒草丛生的地面上，宁静而庄严。老周送我到车旁，往我手里塞了一块黑乎乎的矿石：“留个纪念，水口山的石头。”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坚硬而冰凉。握在掌心，像握住了一段历史。

来时我曾在心里问：一座矿山，凭什么成为国保？如今我已有答案。

水口山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采矿与冶炼的历史。它是近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起步与发展的活化石，是技术完整、脉络清晰、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工业遗产，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它以完整遗存见证民族工业的自强不息，以红色基因镌刻革命岁月的热血荣光，以实干精神诠释湖湘儿女的坚韧担当。在以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为主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中，水口山以工矿遗产价值独树一帜，填补了湖湘文化中工业文明的重要空白，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家瑰宝。

车子缓缓驶出矿区，后视镜里的水口山渐渐变小，最终隐没在山峦之间。我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矿石，它在夕阳余晖里泛着幽幽的光。三湘四水，文脉悠长；湖湘大地，生生不息。从五万年前先民点燃的第一簇文明之火，到楚风浩荡、耕读传家；从近代思潮激荡、革命星火燎原，到工业兴起、实干兴邦，湖湘文明在岁月中不断丰富、升华。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正是这条长河中一颗坚实而闪亮的星辰。

于我而言，写水口山，亦是写我工作过的锡矿山；走读水口山，亦是致敬所有湖南工矿区。我们同血脉、同矿火、同坚守、同魂魄，在三湘大地上书写着共同的工矿传奇。

而我依然怀揣一份朴素的期盼：愿有一天，世界铭记錫矿，也能站上属于它的国保舞台，让百年錫都的魂，与水口山的光一起，闪耀在三湘大地。



常宁市水口山镇，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会旧址——康家戏台。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摄